

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

——基于 shift-share 方法的分行业实证分析

查贵勇

(上海海关学院 经济与工商管理系,上海 201204)

摘要:2012 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 shift-share 方法对 2002—2011 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

关键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解;结构奖赏;结构负担;结构转换;市场化改革;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服务经济

中图分类号:F269.2751;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6-0097-08

一、引言

加入 WTO 以来,随着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关于服务业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且呈现出新趋势:从原先关注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和服务业整体发展的影响因素,逐渐转到关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迁及其动力来源和效应。郭克莎(2000)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第三产业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认为第三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发展;李江帆等(2003)对我国 1991—2000 年第三产业内部四个层次服务业的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指出第二

层次服务业发展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主要趋势和推动力,但没有深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后来有学者对此加以探讨,如:黄维兵(2003)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的输出状况;李勇坚(2004)认为没有一个解释能力特别强的普适因素能解释整体服务业发展;陈凯(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状况、服务业开放水平是影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查贵勇(2007)认为经济发展水

* 收稿日期:2013-08-22;修回日期:2013-10-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青年基金(2010YJC790134);上海市科技创新项目(12YS191);上海海关学院人才引进项目(2311132)

作者简介:查贵勇(1978—),男,安徽泾县人;副教授,博士,2006 年赴美国加州大学研修,在上海海关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任教,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与国际投资研究;Tel:021-28991680, E-mail:zhaguiyong@163.com。

平、分工程度、服务业开放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上述研究存在如下须改进的地方:一是主要分析的是外部因素,没有深入揭示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与结构变迁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仅考虑到增加值指标,而忽略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三是主要以需求对象不同为标准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难以适应服务业行业日益细分的特征和趋势。基于此,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服务业内部行业角度对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行研究。顾乃华(2010)首次利用 shift-share 方法分解 1992—2007 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构成因素,分析认为我国整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各服务行业自身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引致,而源自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转换效应仅占 10%。但该研究以全国为样本,并以城镇服务业就业替代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不同区域以及城乡服务业发展存在差距的客观现实。因此,顾平平(2011)采用 2004—2009 年浙江省第三产业数据,利用 shift-share 方法对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且服务业结构转换效应的贡献度达到 2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浙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不具有“龙头”效应和“先行先试”地位,该研究对其他城市和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不足;同时,以上研究也未分行业进行深入探讨,不足以作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各行业发展提供直接的参考。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业已成为支撑上海经济的主力,其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已达到或接近 60%,已基本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陈宪,2013);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不足,亟待转型突破(肖倍,2013),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查贵勇,2013)。2012 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超过 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且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就业吸收能力逐步释放,但也存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不稳定、产业结构偏离度偏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等问题。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导致 1978 年不变价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仅为名义值的一半,表明上海服务业产品价格上升较

快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查贵勇,2013)。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上海,在提升服务业总量时,更应注重提高其劳动生产率,避免因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不应借助过多干预盲目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裴长洪,201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以便提出科学而可行的措施来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因此,本文将服务经济领先全国的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参考性不强的缺陷;同时,本文考虑到服务业不同分行业的差异,在分解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比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及成因,并对金融业、信息传输与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进行重点探讨,进而提出促进有关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分解的数理模型

目前,Shift-Share 方法是使用最广泛的分解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数理方法,本文参照顾乃华(2010)和顾平平(2011)的做法,利用 Shift-Share 方法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结构分解,即将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各行业内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动两部分(Peneder,2003)。

根据该方法,可将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定义为:

$$LP^T = \frac{Y^T}{L^T} = \sum_{i=1}^n \frac{Y_i^T L_i^T}{L_i^T L^T} = \sum_{i=1}^n LP_i^T S_i^T \quad (1)$$

$$LP^0 = \frac{Y^0}{L^0} = \sum_{i=1}^n LP_i^0 S_i^0 \quad (2)$$

其中, LP 表示服务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 LP_i 表示各细分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Y 表示增加值, L 表示劳动力数, S_i 表示第 i 细分行业劳动力数占服务业劳动力总数的份额, n 表示细分行业个数,0 和 T 分别表示研究阶段的开始和结束时期。从 0 到 T 期的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为:

$$LP^T - LP^0 = \sum_{i=1}^n (LP_i^T - LP_i^0) S_i^0 + \sum_{i=1}^n (S_i^T - S_i^0) LP_i^0 + \sum_{i=1}^n (LP_i^T - LP_i^0) (S_i^T - S_i^0) \quad (3)$$

将(3)式两边同除以 LP^0 , 就可将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三部分:

$$\frac{LP^T - LP^0}{LP^0} = \frac{\sum_{i=1}^n (LP_i^T - LP_i^0) S_i^0}{LP^0} + \frac{\sum_{i=1}^n (S_i^T - S_i^0) LP_i^0}{LP^0} + \frac{\sum_{i=1}^n (LP_i^T - LP_i^0) (S_i^T - S_i^0)}{LP^0} \quad (4)$$

其中, $\frac{LP^T - LP^0}{LP^0}$ 表示从 0 期到 T 期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frac{\sum_{i=1}^n (LP_i^T - LP_i^0) S_i^0}{LP^0} \text{ 表示各行业内部增长效应,}$$

用以衡量每个细分行业维持原来的劳动份额(即不存在结构变动)的情况下,各细分行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对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

$$\frac{\sum_{i=1}^n (S_i^T - S_i^0) LP_i^0}{LP^0} \text{ 表示行业结构变动的静态转移效应,}$$

用以衡量在各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向初始时期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细分行业转移对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在理想情况下,劳动力总是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流动,随着劳动力从低效率行业流向高效率行业,会不断提升服务业整体效率,即所谓的“结构奖赏”,此时该项的符号为正。

$$\frac{\sum_{i=1}^n (LP_i^T - LP_i^0) (S_i^T - S_i^0)}{LP^0} \text{ 表示行业结构变动的动态转移效应,}$$

用以衡量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细分行业转移时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如果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份额同时增长(或同时减少),则该项为正;如果劳

动生产率增长较高的细分行业的劳动份额减少,或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低的细分行业的劳动份额增加,则该项为负^①。根据 Baumol (1967) 非均衡模型,该项为负的情况即是所谓的“结构负担”。

三、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解

由于上海市从 2002 年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新行业标准进行数据统计,所以本文以 2002 年为基期;根据新行业标准,服务业共分为 14 个细分行业,即 $n = 14$;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各细分行业增加值均折算为 2002 年不变价;各细分行业劳动力以年底从业人员数表示;所有数据均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对 2003—2011 年上海市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化及分解情况进行计算,具体结果见表 1。

2003—2011 年,上海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基本为正,虽然贡献度总体下降,但至 2011 年仍高达 85%,表明上海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各细分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预示未来上海更应注重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单纯性的结构转换。

2003—2011 年,上海服务业结构变动的静态转移效应基本为正,动态转移效应始终为负,表明上海服务业“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此与 Peneder (2003) 对欧盟数据、顾乃华 (2010) 对全国样本数据和顾平平 (2011) 对浙江样本数据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从结构变换效应程度看,上海要强于顾乃华的全国样本数据,而低于顾平平的浙江样本数据,这可能是因上海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全国而低于浙江(见表 2)。因为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结构变动就越能反映经济内在运行规律(顾平平,2011),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制度变迁是影响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顾乃华,2010)。

上海服务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与 Peneder (2003) 对发达国家的分析结论相一致。如 2004—2011 年,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提升最快,增长 17.7 倍,超过公共服务业 3.9 倍和现代服务业 3.7 倍的增长幅度(表 3),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最弱。

^①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因为在经济系统中,各行业结构需保持一定的关系,有时为保持行业结构的协调,劳动力等要素可能会从生产率高的行业流向生产率低的行业,弥补“短板”,以更好地促进产业整体的发展。

表 1 2003—2011 年上海市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及其分解

	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行业内部增长效应		行业结构变动的 静态转移效应		行业结构变动的 动态转移效应	
	数值	贡献/%	数值	贡献/%	数值	贡献/%	数值	贡献/%
2003	-0.008 30	100	-0.023 5	281.99	0.029 35	-352.290	-0.014 19	170.32
2004	0.054 50	100	0.089 81	164.77	-0.004 10	-7.431	-0.031 25	-57.347
2005	0.101 08	100	0.131 40	129.99	0.016 67	16.496	-0.046 99	-46.488
2006	0.187 12	100	0.218 74	116.90	0.018 25	9.753	-0.049 87	-26.650
2007	0.282 53	100	0.333 76	118.13	0.065 57	23.208	-0.116 79	-41.338
2008	0.345 10	100	0.322 11	93.336	0.090 94	26.351	-0.067 94	-19.687
2009	0.485 13	100	0.487 97	100.59	0.125 80	25.932	-0.128 64	-26.518
2010	0.524 57	100	0.504 05	96.088	0.139 67	26.625	-0.119 14	-22.713
2011	0.639 78	100	0.546 42	85.407	0.232 00	36.263	-0.138 64	-21.670

注:限于篇幅,各细分行业数据未列出,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zhaguiyong@163.com.

表 2 全国、上海和浙江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平均
全国	4.42	4.64	5.02	5.50	6.10	6.69	7.09	7.50	7.18	7.34	7.60	6.28
上海	5.75	7.62	8.34	9.35	9.81	10.25	10.79	11.71	10.42	10.96	11.11	9.65
浙江	6.57	7.64	8.37	9.10	9.77	10.22	10.80	11.39	11.16	11.80	12.04	9.90

注:全国数据为各省市数据的简单算术平均数。

资料来源:樊纲和王小鲁著《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 2011》(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表 3 上海三大类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分析

	公共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	
	数值	占比/%	数值	占比/%	数值	占比/%
2003	0.010 4	-44.42	-0.028 7	122.32	-0.031 9	135.77
2004	0.031 5	35.06	0.018 4	20.49	0.046 5	51.75
2005	0.049 1	37.36	0.036 4	27.70	0.035 8	27.26
2006	0.069 5	31.78	0.102 0	46.65	0.071 0	32.45
2007	0.097 8	29.29	0.198 8	59.55	0.159 9	47.91
2008	0.107 7	33.45	0.191 1	59.34	0.133 5	41.43
2009	0.126 8	25.98	0.296 3	60.72	0.275 3	56.43
2010	0.140 0	27.77	0.338 0	67.06	0.227 4	45.11
2011	0.153 7	28.15	0.343 1	62.79	0.217 8	39.86
均值	0.087 4	30.13	0.166 2	57.28	0.126 1	43.49

注:(1)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6 个行业;(2)现代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7 个行业;(3)公共服务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4 个行业。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显著,主要得益于合理的规划。如2003年6月上海市经委根据城市功能发展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列入《上海工业方向导向及投资指南》鼓励类栏目;2006年1月《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草案)》确定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发展领域;2009年2月颁布《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及空间布局规划》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重点指南》确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方向和8个重点领域——总承包总集成、第三方物流、服务外包、节能环保服务、融资租赁、研发与创意服务、咨询服务和专业售后服务,符合Castellacci(2008)提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应专注于技术密集型或R&D密集型行业,提供金融中介服务、会计、法律、半导体芯片设计等专业的知识—技术解决方案,促使生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的论断。相应的,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于2004年、2006年和2009年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但是,公共平台缺失、服务体系不完善、发展战略模式排除民营经济都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王铮,2008),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没有完全打开局面是受政府政策和市场发育程度所限(石涛,2010)。因此,上海应积极采取综合而非单纯的结构转换推动政策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如以园区建设引导集聚发展^①、以专项支持重点门类发展^②、以政策突破促进转型发展^③等。

而上海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主要在于其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偏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3)。公共服务多数由政府提供,其他社会主体无法通过竞争来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从而无法利用市场的竞争和活力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业的质量和效益,亦无法提升公共服务业的内生增长。

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前者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而后者位居倒数第二,仅高于房地产业。表4显示,上海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

效应出现了三次飞跃:2004年由负转正;2007年突破0.1,增长1.8倍;2009年突破0.2,增长0.8倍。三次飞跃对应三个重要文件的颁布和实施:2004年2月的《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2006年11月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一五”规划》和2009年4月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国发[2009]19号)。这些文件不仅明确各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原则和框架,更提出涵盖金融集聚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法制环境、诚信体系、金融信息化、金融辅助产业、金融人才队伍等方面的具体措施,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市场化进程(见表5),进而推动金融业内部增长。

相较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与软件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却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这与该行业发展主要依赖基础性的服务外包密切相关。如发展成熟、较为低端化的信息技术外包(ITO)仍然是上海软件出口的主要方式,占比高达98.2%(宋杰宇,2012);2011年上海和全国服务外包中IPO占比分别约为70%和60%(商务部驻上海特办处,2012)。虽然信息技术外包有利于扩大产值和吸纳就业^④,但因技术—知识含量较低,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等作用甚微。特别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下,将资源投入技术—知识含量不高的生产服务业并非明智之举,不仅浪费资源,且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从而不利于促进产业攀升至价值链高端。该弊端已在我国部分“服务外包基地”及相关产业集聚区有所显现(刘奕等,2009)。因此,上海更应注重该行业自身发展,而非单纯追求结构转换或就业比重的增加,如大力发展科技含量较高、涉及领域多、业务综合性强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以紧跟服务外包产业新的发展方向,使服务外包逐步向高端化、科技化方向发展。

① 比如,2009年6月上海重点推进首批19个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形成特色功能,建设公共平台。

② 比如,制定《上海市总集成总承包工程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累计支持重大装备、物流、节能环保等90多个项目。

③ 比如,制定《进一步鼓励支持制造业主辅分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财税政策意见》,推进营业税差额征收。

④ 如2002—2012年,上海该细分行业当年价增加值增长3.7倍,2000年不变价增长3倍,就业增长6.4倍。

表 4 上海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及软件业的内部增长效应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信息传输、计算机及软件业	-0.020	-0.019	-0.021	-0.014	-0.021	-0.015	-0.027	-0.025	-0.031
金融业	-0.013	0.034	0.023	0.053	0.149	0.127	0.232	0.216	0.185

表 5 上海金融业市场化进程分析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金融机构单位数	-	372	445	504	607	689	794
外资金融单位数	78	98	105	110	151	165	170
金融市场化程度	9.94	10.71	10.01	10.06	10.49	11.96	12.56
金融业竞争指数	10.12	11.72	10.24	10.20	11.01	10.98	12.1
信贷分配市场化	9.76	9.70	9.78	9.92	9.97	12.94	13.02

资料来源:前两个数据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公报》整理;后三个数据来自樊纲和王小鲁著《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 2011》(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时间推移,上海服务业总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持续增大,属完全累积型;除个别年分外,各行业内部增长效应、行业结构变动的静态和动态转移效应的相对变化都呈现出波动中增大的趋势,属高度累积型。但需注意,行业内部增长、“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等效应都易受外部冲击。如 2008 年行业内部增长效应微幅下滑,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增速大幅下降,但为响应政

府缓解就业压力的号召,这些行业,特别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增速远超增加值增速(见表 6),导致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幅度($LP_i^t - LP_i^0$)变小,从而削弱了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但就业迅猛增长致使就业比重变动幅度($S_i^t - S_i^0$)变大,使得服务业“结构奖赏”效应增强;且就业比重提升幅度($S_i^t - S_i^0$)远高于劳动生产率下降($LP_i^t - LP_i^0$)幅度,致使服务业“结构负担”恶化趋势得到缓解。

表 6 2008 年上海部分服务行业内部增长效应、增加值增速和就业增速

	内部增长效应		增加值增速/%		就业增速/%
	2007	2008	2007	2008	200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077 66	0.036 77	8.6	0.9	29.66
住宿和餐饮业	-0.006 95	-0.008 53	9.1	3.2	7.11
金融业	0.148 80	0.126 76	34.3	12.7	20.03
房地产业	0.010 76	-0.006 34	10.8	-8.6	3.49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0.001 77	-0.005 08	-3.7	-0.5	25.15
教育	0.053 83	0.053 39	15.4	10.2	10.66
文化、体育和娱乐	0.011 55	0.009 89	12.7	4.1	9.16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www.stats.gov.cn.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 shift-share 方法对 2002—2011 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表明结构转换可提升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而各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其中关键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对此,上海应注意:

第一,在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在确保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转换产业结构;应从稳步推进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入手,通过深化政经体制改革为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优化创造良好环境,而非单纯追求总量增长、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提升所展现的短期效应。

第二,加快政府体制创新步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形成服务业市场良性竞争机制。如:通过多种形式将市场或民间部门引入公共服务的生产及提供,即以市场化方式提供部分公共服务;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扩大非公有经济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强化多元市场主体发展格局,促进现代服务业企业发展,并放宽现代服务业企业经营范围限制,打破垄断,强化竞争,增强其整体竞争力。

第三,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机遇,力争在诸多服务贸易领域提高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如放开股权限制、业务范围等;不断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如注重将外资引入金融、保险、通讯与信息服务业等亟待发展与提高的高层次服务业,鼓励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扩展高层次研发服务;鼓励服务业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开展合资合作、战略联盟、品牌共建、技术交流、管理创新,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 陈凯.2006.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J].财贸经济(10):53-58.
- 陈宪.2013.服务业达到 60%后,上海怎么办[N].解放日报 2013-01-22(8).

- 顾乃华.2010.结构奖赏还是结构负担?——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变动与生产率演变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6):106-112.
- 顾平平.2011.结构奖赏还是结构负担——以浙江省第三产业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6-32.
- 郭克莎.2000.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与高效发展[J].财贸经济(10):51-56.
- 黄维兵.2003.现代服务经济理论与中国服务业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66-70.
- 李江帆,曾国军.2003.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3):34-39.
- 李勇坚.2004.中国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财贸经济(7):12-15.
- 刘奕,夏杰长.2009.全球价值链下服务业集聚区的嵌入与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12):56-65.
- 裴长洪.2012.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服务业发展[A].成都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西南财经大学,2012-05-12.
- 商务部驻上海特办处.2012.上海 2012 年前三季度软件出口保持快速增长[EB/OL].(2012-10-26)[2013-06-08].中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resume/n/201210/20121008403368.html>.
-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3.上海服务贸易创新突破发展对策思路研究[J].科学发展(6):13-27.
- 石涛.2010.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取向[N].文汇报,2010-12-12(008).
- 宋杰宇.2012.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再入“黄金”十年[N].国际商报,2012-10-17(A8).
- 王铮.2008.上海发力生产性服务业[J].上海国资(4):20-21.
- 肖倍.2012.上海服务业发展亟待转型升级[J].上海人大(9):21-22.
- 查贵勇.2007.中国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12-17.
- 查贵勇.2013.上海服务经济发展态势与问题分析[J].科学发展(1):65-72.
- BAUMOL W J. 1967.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 57:415-426.
- CASTELLACCI F. 2008.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regimens and trajectorie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in a new taxonomy of sectoral patterns of innovation [J]. Research Policy, 37(6-7):978-994.
- PENEDER M. 2003.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growth [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4:427-448.

Analysis of Labor Productivity Change of Shanghai Service Industr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Sub-sectors of Shanghai Based on Shift-share Method

ZHA Gui-yo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01204, China)

Abstract: In 2012, the ratio of the value-added of Shanghai service industry to GDP is over 60 percent and reach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service economy”. The shift-share method is used to decompose the change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industry of Shanghai during 2002-2011,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structural prize” and “structural burden” exists, and the “prize” is stronger than the “burden”, that the inn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otal industrial labor productivity, but its impetus is limit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mainly emanates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each sub-sector labor productivity, however, market-oriented reform is its main impetus, that the industries with the rapidest growth of inner labor productivity mainly includ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field, however, the growth effect in public service industry is at the lower-side, but the growth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financial industry in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is fastest. Thus, Shanghai should speed up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all sub-sectors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respective development laws but should not unilaterally seek the industry structure changes.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labor productivity decomposition; structural prize; structural burden; structural conversi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public service industry; service economy

CLC number: F269.2751; F224.0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3)06-0097-08

(编辑:南 北,段文娟)